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研究

阳桂红 宋之瑶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经世致用”是儒家的“外王”，是湖湘文化的精华。“经世”的内涵是“经邦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结合实际，侧重“形而下”。本文通过对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上的追溯，探讨了其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对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经世治国和提升国民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湖湘文化； 经世致用； 文化； 反思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儒家学说的一支正脉，湖湘之学在继承“周孔之道”^[1]的同时，更强调经世致用。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和毛泽东等数百位湖南人在中国思想政治军事舞台大放异彩，业绩辉煌，影响深远，而熏陶造就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同时，经世致用学风为近代中国先进人士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奠定了积极有效的学术思想基础。那么，在经世致用思想价值影响下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针对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呢？

一、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

湖湘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这个文化区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物，他们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使得湖湘士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闪光点。同时，要对经世致用思想有进一步的研究，就必须学会追古溯今。关于经世致用的渊源，学术界历来看法各不相同，根据历史线索，则可分为远古到秦汉、唐宋到明清以及近代。也有个别认为它产生于明末清初，于嘉庆、道光年间才得到发展。笔者认为依据湖湘文化发展的轨迹，经世致用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儒家思想。

首先，在《春秋》这部史学著作中，就充分显现了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正名思想。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正名”就是指遵从礼法，让名符合实际。孔子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不遵守礼法，也就是名不副实。要让天下平息争斗，恢复和平，最根本的是让天下名实相符。

其次，对于宋明理学的虚浮不实、侈谈心性，明末清初的一批儒学大师看在眼里，决心要扭转学风、世风，高举起批判理学的旗帜，提倡以“通经致用”、“崇实默虚”、“明道救世”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其核心思想就是“经世致用”。关中著名儒学大师李颀(1627—1705)也指出理学家们的“空疏之习，无当实用”，力主“躬行实践”，使“经世事宜，实实体究，务求有用”^[3]。也就是说，学术应该有体有用，二者不能分割开来，求学应求“明体适用之学”^[4]，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切实有用的学问。以此，又将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向前推进了一步，赋予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致用内容。

[1] 唐代以前是儒学教育的别称，周公与孔子被合称为“周孔”。

[2] 《论语·子路》

[3] 李颀《四书反身录》卷二。

[4] 李颀《二曲集》

再次，近代清王朝积贫积弱，外夷入侵，维新志士杨毓麟就曾说，湖南人有一种特别独立之根性，他们能够“师心独往”（周敦颐），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王船山）。随后出现的洋务派，即所谓“新派”，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经营模式等等。洋务派的主要观点就是“经世致用”，强调要实际操作，学习新兴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否颠覆传统，反正是要归于实际。以及被后人所熟知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先生，他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者，验证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有效性，而之前的湖湘人则主要是研究型、理论型。更有甚，在当时有外国人评论说：“中国政府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求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5]林总督率先将经世致用的“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跨入了向近代转变的新阶段，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睁眼看世界之人。

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明代大臣倪岳说到湖南风气：“其士习则好文而尚义，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故习之相近，固多问学志节之风；而性只所染，亦多豪桀鹜之态。”在湖湘本土的民性与经世致用思想的矛盾相融合下。经世致用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湖湘的知识分子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二、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学习中，我们所熟知的最典型的经世致用思想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与独立创新。古人有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6]意思是与其看着着深深的潭水又想得到这水里的鱼，不如先回家去结网。这一典故告诫人们，在想法与行动之间，有明确的想法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实现这一想法的必要行动，想法将是空幻而不切实际的。大家顾炎武曾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强调要注重联系社会的现实解决问题，这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知行合一、力行实践、实效实用的有效结合。就是要求他们把天下、国家、民生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要求。这种实事求是的特点，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方面，在诸多学者对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的评价看来，往往是将两种十分不同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现象融为一体，故而能够呈现出一种多姿的风貌和多彩的景象，尤其是在动荡的政治变局和痛苦的历史转型中，这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表现的淋漓尽致。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在文化领域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概念的逻辑范畴上划分的话，文化是大概念，教育则是小概念，前者包涵后者。研究者靳环宇、胡国强、蒋书同认为教育是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次级系统，文化决定教育的规模、范围、内容、对象等等方面。同时，教育又在文化系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别的次级系统所不能替代的功能。比如，教育的繁盛与否能影响文化的规模、范围、程度等方面。其次，教育也直接决定着文化的生命力。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教育与文化两个概念又有着价值对等的意味。正是文化与教育二者之间的互容性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可以转化为教育传统，文化资源也可以转化为教育资源。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作为一种绵绵不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无疑会对后世的文化形态和教育形态起着塑形作用。作为传统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经世致用思想，它影响了整个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就是为何在近代湖湘文化和近代湖南教育领域都弥漫着浓郁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也就形成了横跨文化和教育两个领域的经世致用学风。

经世致用思想对湖湘学风的塑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人对湖南近代经世致用的

^[5] 姚莹《康转纪行》卷十二，卷五。

^[6] 刘安《淮南子·说林训》

代表人物推崇尊敬，奉之为楷模加以学习；二是受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当时的学习风气浓厚，严谨。其学风是中国近代一种进步社会思潮，并且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为近代湖湘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提供了积极的学术思想底蕴。它要求先进人士关注国计民生，学习于国有益的实际之学，将之与国家的富强和振兴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属于封建末世经学主变派的陶澍、贺长龄、熙龄兄弟、魏源、汤鹏、邓显鹤等，还是属于稍后的理学经世派的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等，他们前后相承的经世致用学术风气在近代湖南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湖湘文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具有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同时，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严谨开放的学风，使它的基本特点和积极方面尤为闪亮。但是，任何事物的影响都是具有两面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湖湘文化不仅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甚至其积极的方面也包含着某种消极的因素在内。

从地域地形上来看，它对于湖湘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一种不如沿海文化那样的富有激情、扩张的不可抗力，从而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文化类型，使得湖湘文化在根本上保留了儒家传统文化中“守先正”^[7]的古朴气质，即小心谨慎、固守“正人先正己”的思想。湖湘文化的地理条件使得其居于文明的十字路口，地理特点是一块向北张开的马蹄形盆地：湘东有幕阜、武功诸山，于东南气流有阻滞作用；湘南南岭山脉横亘东西，成为我国温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湘西北为武陵山脉绵延，湘北为广阔的洞庭平原，中部丘岗起伏。山山水水、山水相连，山使人坚强，水使人豁达。湖南自古就较西南、东南地区便于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而由于其内陆的位置，崇山峻岭的阻隔，与东南沿海相比，接受海洋文明又较为不便。同时，由广东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阻扼于粤北南岭，资本主义文明在湖南的传播也不如东南沿海。

从盛行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看，湖湘学子们相当注重政治传统，形成了心忧天下、心怀天下的权力价值观，虽强调躬行实践却热衷于政治伦理领域。从近代以来，湖湘书院涌现出了大量人才，以至有“惟楚有材”之称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同时又有传闻，当时郭嵩焘、曾纪泽或出任驻英法大使或与沙俄谈判，亦被故乡人目为有辱先祖的民族败类，受到种种攻讦。以致郭嵩焘离任回至故乡长沙时，码头上冷冷清清，地方官员“傲不为礼”，拒不接待。毛泽东也曾说他青年时听闻的一事：一位留学生购了一艘火轮驶入湘江，不料却引起两岸乡绅大哗，认为这艘洋怪物破毁了家乡的龙脉，冲坏了家乡的风水，留学生差点被乡民活活毆死。德国地质学家见希霍芬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多次深入中国各地考察地域文化，他如此形容湖南人的气质：“中国军人主要产生于此，很多官员也出生在湖南。但是，银行界和商业界湖南人却不多”。^[8]一直延续到当代，这些“楚材”依然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社会学家，他们活动的舞台主要在政界、军界和文化界。不难发现，确实很少有自然科学家、实业家和金融家。

三、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当代启示

我们要肯定的是，经世致用思想作为曾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潮，既关注于社会现实问题，着力解决社会矛盾和危机，它对湖湘学人士子的影响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由这种学风熏陶而出的湖湘人才已在中国历史中尽显光芒，其价值和意义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正因如此，它深得人心的学术传统在实行中的积极效应、爱国忠君的伟大精神、关心国事等优良传统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与发扬光大。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上述所说的负面影响而继承发扬其正面效应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7] 周公旦《周礼》

^[8] 谭长富、康化夷《湖湘文化的反思》

（一）辩证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日常所说的保护与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味的要求大家盲目继承与颂扬。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想要对当代中国文化作出深刻的了解与贡献，就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同时，在经世致用传统思想的潜移默化下，一部分较为倾慕西方实用主义文化的人，在取舍某些传统文化之际往往缺乏真知灼见，他们通常对自己需要什么、应当做什么都还很迷茫，却已迫不及待地要用西方的那套理论来安插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他们的这类急功近利就是犯了“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为人”^[9]的毛病。即经常一知半解，说些很模糊很空洞的大话，读书做事很浮躁，常常沉不下心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许多号称高文凭的中国官员身上，我们也见不到什么学术的修养。足以说明政治素质也是离不开学术思想的基础。当代中国政治素质的普遍低落正反映了学术思想衰微的一般状态。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对其辩证以待了。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既不可一味的故步自封，抵触外来新文化与新思想，也不可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这将是阻滞我们民族文化发展进程的两个极端。只有科学辩证地借鉴、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深入探究外来文化的哲学基础，才是促进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经世治国更需要哲学文化自觉

据报道，迄今为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 22 次集体学习，其中 2 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2013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 11 次集体学习。这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10]在他看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理解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并实施的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利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可见，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维的思想力量是战胜目前急功近利思想的重要理论武器。

同时，哲学的发展观思想不仅注重客观事物的研究，也致力于创新发展。正因为独立思考贵在有创新的精神。同时，哲学的发展观思想还强调，创新如果能在有限的知识中推陈出新，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此，当下我们要想为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打好基础，不仅要积累广泛的知识，而且不可局限于知识，要学会在积累之上运用知识发散思维，从而为创新提供更多的机会。

（三）提升国民精神生活与追求

受“务当世之务”思想的影响以及内陆文化的熏陶，现今大多湖湘子弟的远大的目标，莫过于考上国家公务员。甚至于，在大多父母一辈人的思想观念中，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约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始终是第一要义，学术思想则是第二要义，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自足的意义，而是为政治服务的东西。子女们能投身于政事会比其他职业更有社会地位且光耀门楣。然而，相较大多发达沿海地区的长辈观念，似乎创业经商更值得他们的孩子去追求。因此，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往往会使人将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与光宗耀祖的狭隘心理纠结一起。从这一思想出发，不少湖湘精英往往把经天纬地的民族大业视为少数宗族、亲人之事，缺乏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表现出强烈的排他心理。这是湖湘文化对内而言最明显的消极的一面。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进行进一步

^[9]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

^[10] 光明网《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思维：战略辩证法》

反思,在当今社会,一切学术文化思想,等不及实事求是的研究思考,便即刻政治化了。任何一种再好的思想学术,都来不及消理解,来不及在学术思想方面有真实的成就,便已卷入各种政治旋涡中去了。^[1]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经世致用”必然逐渐会演化出急功好利、急于求成的心态。因此,社会中屡禁不绝的“急功好利”思想已然是“经世致用”传统思想在贯彻中负面效应的表现,也更加需要我们花费功夫来加以探讨和吸取教训。

马尔库塞曾断言,本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层群众因为经济的贫困和物质的匮乏,对现实不满,存在着强烈的否定意向,因而经济上是积极的、进取的,现在由于这种物质的满足和享受,就没有了这种精神上的自由,社会开始产生普遍的商品拜物教,人变成了物,成了物质的奴役工具,即单方面发展的人。因此,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正是这种物质的满足,使以前在物质与精神上有极大需求、不断进取的人们变成了仅仅只是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而精神上却极度匮乏。

正如温家宝总理曾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要如何在追寻经世致用与精神生活统一的道路上,通过繁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塑造与精神生活的提高使得矛盾问题的解决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才是本文意义的真正所在。

参考文献

- [1] 刘玲. 湖湘文化研究综述[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 [2] 王国庆. 经世致用学风与近代湖南[A]. 长沙大学学报. 2001(15)
- [3] 王兴国.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6)
- [4] 靳环宇, 蒋书同, 胡国强. 论湖南经世致用学风[J]. 当代教育论坛. 2003(12)
- [5] 鄒国义. 论近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J]. 史林. 2003(06)
- [6] 沈艳. “经世致用”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J]. 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2(05)
- [7] 谭长富, 康化夷. 湖湘文化的反思[J]. 求索. 2004(06)
- [8] 王丽梅, 周义顺. 经世致用的近代解读[J]. 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06)
- [9] 唐浩明. 湖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J]. 求索. 2004(12)
- [10] 万里.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3)
- [11] 李挺. 晚清湖南的经世致用思想[J]. 华夏文化. 1999(03)
- [12] 周秋光. 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及其缺陷[J]. 船山学刊. 2001(04)
- [13] 杨志文. 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J]. 文史哲. 2011(03)
- [14] 程伟礼. 经世致用与当代中国文化矛盾.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03)

^[1] 程伟礼《经世致用与当代中国文化矛盾》

Study on Pragmatism of Hunan culture

Guihong Yang zhiyao Song

(Marx's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Pragmatism" is the Confucian "outside", is the essence of Huxiang culture. Connotation of "the world" is the "managing nation", stressed the need to have lofty ambitions, focusing on "metaphysics"; "connotation" is "combination", stressed the need to focu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back statecraft thoughts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Huxiang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for us today, how to better promote the national culture, administering a country and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spirit of life.

Keywords: The Huxiang Culture;pragmatism;Culture;Reflection

作者简介:宋之瑶（1992.5—）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4 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